

· 批评与争鸣 ·

“可敦墓”考*

——兼论十一世纪初期契丹与中亚之交通

白玉冬

摘要：《突厥语大词典》记录的古地名 Qatun Sini “可敦墓”位于哈密东，纬度与哈密相同，难以勘同为呼和浩特南郊的昭君墓。以《突厥语大词典》圆形地图给出的于都斤的地理方位——额尔齐斯河源头为参照物，探讨 Qatun Sini “可敦墓”的地理位置，其前提偏离了正常的研究轨迹。将昭君墓视作可敦墓，存在名称上的龃龉与逻辑思维上的本末倒置。将《突厥语大词典》所述与唐古特族发生过战斗的 Qatun Sini “可敦墓”，视作漠北达靼地内的镇州可敦城不悖于理。虽然漠南地区存在连接契丹与西夏、喀喇汗朝的通路，但马卫集记录的由喀喇汗朝前往契丹的交通线，是从沙州经由漠北的于都斤与镇州可敦城后抵达契丹，反映的是 11 世纪初期的情况。

关键词：可敦墓 《突厥语大词典》 于都斤 契丹 喀喇汗朝

Qatun Sini “可敦墓”是见于突厥语、阿拉伯语文献中的我国北方地区古地名。相比于西北地区丝路沿线的著名城镇，历史上的可敦墓可谓默默无闻。笔者之所以对其进行讨论，是由于它与沟通 11 世纪初期北部中国和中亚地区的交通路线走向有关。

在麻赫默德·喀什噶里 (Maḥmūd al-Kāshyari) 11 世纪 70 年代编纂的《突厥语大词典》(Dīwān Luḡāt at-Turk) 所附的圆形地图上，^① Khātūn Sini (Qatun Sini) “可敦墓”远处 Māsīn “马秦 (宋)”西北方向。据词典相关词目，Qatun Sini “可敦墓”是位于“西夏与契丹”之间的某座城市，那里的居民曾与唐古特族 (党项) 发生战斗。另，马卫集 (Marvazi) 于 1120 年完成的《动物的自然属性》(Ṭabā'ī al-Ḥayawān) 记录有自沙州经 Khātūn-san、Ūtkīn 到达契丹首都 Ūjam 的路程。系统研究马卫集书的米诺尔斯基 (V. Minorsky) 指出，上述马卫集记录的

* 本文获日本学术振兴会外籍特别研究员奖励金项目“丝路史观下的西州回鹘史研究：以人、物的流动与文化的传播为核心”、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招标项目“突厥文回鹘文摩尼教历史相关文献辑录”项目资助。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专家提供宝贵意见。

① 阿拉伯文版彩色地图载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 1 卷，校仲彝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年，卷首版权页后地图专页背面；英文版黑白地图载 Maḥmūd al-Kāshy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R. Dankoff and J. Kelly, eds. and trans., vol. 3,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1985, vol. 3 卷尾末页。

Khātūn-san 来自比鲁尼 (Birūnī) 在《麻苏迪宝典》(*al-Qānūn al-Masūdī*, 1030 年后不久成书) 中记录的 Khātūn-sin “贵妇人墓 (可敦墓)”, 并将《突厥语大词典》的 Qatun Sini 与马卫集记录的 Khātūn-san 分别视作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的可敦城与乌拉特中旗阴山北麓的可敦城。^① 英文版《突厥语大词典》编者之一的丹柯夫 (R. Dankoff) 受米氏影响, 亦把 Qatun Sini 勘定在额济纳河流域。^② 1978 年, 张广达教授在系统介绍《突厥语大词典》时给出了中文版地图, 并在紧靠 Qatun Sini 的左上方与右上方分别标出“可敦城”与“可敦墓”,^③ 但未指明具体位置。这一地图此后为汉文版《突厥语大词典》所沿用。^④ 杨富学、陈爱峰在讨论大食与契丹关系时指出大食经由西夏地入贡契丹, 上述马卫集书中的 Khātūn-san 为可敦城, 位于今杭爱山脉支系乌德健山, 惜未进行深入考证。^⑤ 笔者在考察 10 世纪漠北的九姓达靺部落与丝路贸易关系时, 提出 10—11 世纪虽然存在穿行于漠南、连接河西至契丹本土的交通线, 但上述 Qatun Sini 与 Khātūn-san 均为漠北达靺地内的可敦城, 即位于杭爱山脉 (历史上的 Ötükän Yiš “于都斤山”) 以东、土拉河畔的镇州可敦城。^⑥ 钟焯力陈 Qatun Sini 与 Khātūn-san 指的是漠南的昭君墓, 并论证 11 世纪存在沙州—丰州—契丹这一东西交通线。其主要依据是 Qatun Sini 是“可敦墓”, 非“可敦城”, 漠北镇州一带的突厥回鹘时期草原石人多为男性, 且距离西夏遥远, 未标出唐古特与契丹的上述圆形地图让人误以为可敦墓位于畏兀儿与宋之间, 圆形地图记录的 Ötükän (或作 Ötükän) “于都斤”之地与可敦墓地望相差极大, 与西夏发生战事的达靺应为夏国附近的达靺。^⑦

概言之, 关于 Qatun Sini “可敦墓”的地望及其与可敦城之间的关系, 学术界观点不一。其中, 额济纳河流域存在可敦城的看法, 经由前田直典与岑仲勉二位考证, 难以立足。^⑧

有古突厥语知识者均知, sin 确有坟墓之意。笔者视 Qatun Sini “可敦墓”为“可敦城”, 是基于前辈学者的研究。至于昭君墓与阴山北麓的可敦城, 笔者在进行相关论证时曾作过比较, 但未能详尽。故撰此稿, 以求大家评判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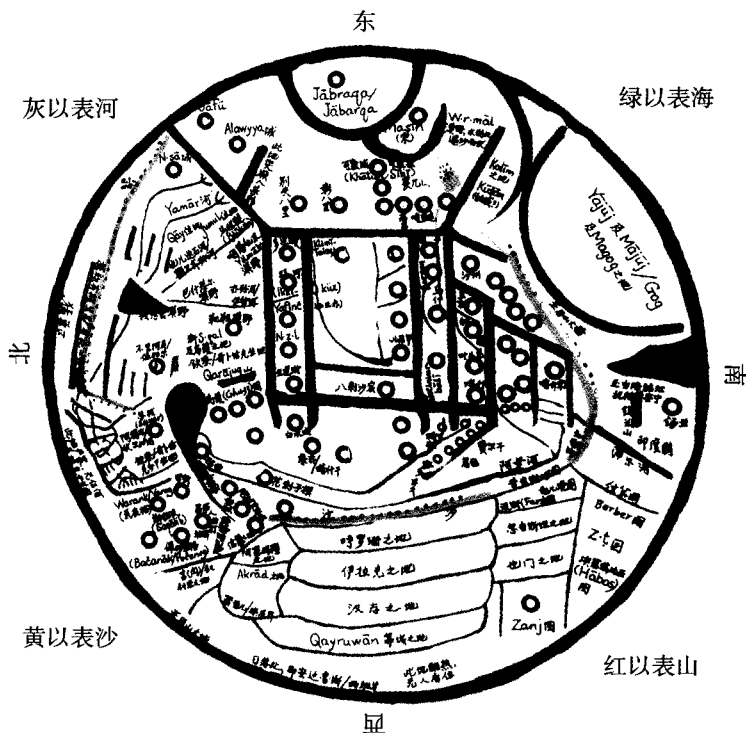
一、《突厥语大词典》圆形地图所见 Qatun Sini 地望

《突厥语大词典》作者喀什噶里出生在今新疆喀什, 是喀喇汗朝著名学者。他根据自己多年

-
- ① V. Minorsky, *Sharaf al-Zamān Tāhir Marvazī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42, pp. 68-69, 73-74.
- ② R. Dankoff, “Three Turkic Verse Cycles Relating to Inner Asian Warfare,” in S. Tekin and I. Ševčenko, eds., *Eucharisterion: Essays Presented to Omeljan Pritsak*,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vol. 3, no. 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1980, pp. 164-165.
- ③ 张广达:《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 年第 2 期,收入氏著:《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53 页。
- ④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 1 卷,卷首版权页后地图专页正面。
- ⑤ 杨富学、陈爱峰:《辽朝与大食帝国关系考论》,《河北大学学报》2007 年第 5 期,第 37 页。
- ⑥ 白玉冬:《十世紀における九姓タタルとシルクロード貿易》,《史学雑誌》第 120 編第 10 号,2011 年,第 11—18 页,尤见第 15、18 页。
- ⑦ 钟焯:《辽代东西交通路线的走向——以可敦墓地望研究为中心》,《历史研究》2014 年第 4 期。
- ⑧ 前田直典:《十世紀時代の九族達靺——蒙古人の蒙古地方の成立——》,《東洋学報》第 32 卷第 1 号,1948 年,收入氏著:《元朝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3 年,第 237—239 页;岑仲勉:《达怛问题》,《中山大学学报》1957 年第 3 期,第 122 页。

的实地调查，晚年在巴格达以阿拉伯语来注释突厥语词汇，编纂成《突厥语大词典》。

关于《突厥语大词典》所附圆形地图的渊源及丰富的历史学价值，张广达教授早已作过精辟的分析与介绍。他指出，该图是作者在突厥诸部多年访问调查的实际情况的真实反映，就中亚地区的内涵之丰富而言，该地图是此前任何伊斯兰舆图所望尘莫及的。这一点可从地图记录的中亚与新疆的地理名称、部族名称的分布情况上充分了解到。^①



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圆形地图

地图正中央是喀喇汗朝都城之一的八刺沙衮 (Balāsāyūn, 遗址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东南), 其正北方是怛逻斯 (Tarāz, 遗址在今哈萨克斯坦塔拉斯市)。自怛逻斯至别失八里 (Bēš Baliq, 遗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 自西向东排列有 6 个地名, 其中包括双河 (Ekki Ögüz, 今新疆博乐市东约 20 公里处的双河市)。虽部分地名尚有待勘同, 但该路程无疑应是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在 1254—1255 年间出使大蒙古国首都哈喇和林后返程经过的草原丝路之一段。^② 而八刺沙衮东南的八尔思罕 (Barsqān) 往东的 4 个地名虽未被标出, 但其南侧的乌什 (Uç),

① 关于《突厥语大词典》地名的相关研究, 主要参见张广达:《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第 52—61 页;牛汝辰、牛汝极:《〈突厥语词典〉第一卷新疆地名研究》,《西北史地》1987 年第 4 期,收入校仲彝主编:《〈突厥语词典〉研究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87—195 页;牛汝辰、牛汝极:《〈突厥语词典〉第三卷地名译释》,《西北史地》1990 年第 2 期,收入校仲彝主编:《〈突厥语词典〉研究论文集》,第 196—197 页;霍加阿合买提·优努斯:《〈突厥语词典〉所载地名的历史价值》,校仲彝主编:《〈突厥语词典〉研究论文集》,第 303—306 页。

② J. A. Boyle, "The Journey of Het'um I, King of Little Armenia, To the Court of the Great Khan Möngke,"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9, no. 3, 1964, pp. 181-184; 乞刺可思·刚扎克赛:《海屯行纪》,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第 15—19 页。

Barman (应即王延德《使高昌记》记录的高昌回鹘辖下的末蛮)、库车 (Kuča)、唆里迷 (Sulmi, 即焉耆) 一线,^① 喀什 (Kāšyar)、叶尔羌 (Yärkänd)、和田 (Khotan)、且末 (Jurčän) 一线, 与塔里木盆地北南两侧丝路交通主干线城镇排列顺序相一致。至于高昌回鹘境内的唆里迷、高昌、彰八里 (Janbaliq)、别失八里等 6 地则自南向北排列, 其中唆里迷南侧的城镇, 以及高昌与彰八里之间的城镇未标名称。按焉耆在高昌西南, 彰八里在别失八里西, 则按南北向排列的上述 6 城中, 焉耆、彰八里和别失八里的地理位置出现了些许偏差。同样, 位于八刺沙衮西面的怛逻斯被标在其正北方——这与今日的地图相比同样存在偏差。但瑕不掩瑜, 作为时人之描绘, 该图对新疆和中亚的记录有着极大的可靠性, 反映出作者对上述地区的熟知程度。

在上述圆形地图上, Qatun Sinī “可敦墓”被远远标于 Māšīn “马秦 (宋)” 西北方向, 其东、南、北三面近旁并无任何其他地理名称。而且, 由于该地图并未标出唐古特与契丹, 故被作者记作位于“唐古特与契丹之间”的 Qatun Sinī “可敦墓”实际上并无直接的参照物。幸运的是, 虽未标上地名, 但喀什噶里在 Qatun Sinī 正西方东西向标注有两座城市, 其纬度与 Qatun Sinī “可敦墓”保持一致。其中, 东面邻近可敦墓的城市右侧标注有“畏兀儿之地”, 而西面的城市位于高昌与彰八里之间, 也即上面介绍的高昌与彰八里之间的不知名城市。因该地图缺少唐古特与契丹, 故上述畏兀儿之城市实际上成为确定 Qatun Sinī 位置最重要的参照物。

因上述地图并未标出唐古特与契丹, 故钟焯以为该地图容易使人误以为可敦墓位于畏兀儿与宋 (即桃花石) 之间。如喀什噶里在相关序文中所介绍, 畏兀儿以东依次是唐古特、契丹、桃花石 (宋)。依此而言, 即便地图上标出唐古特和契丹 (秦), 也不会影响到上述高昌回鹘之城市成为确定 Qatun Sinī “可敦墓”纬度的关键参照物。何况在地图上, Qatun Sinī “可敦墓”距宋相当遥远, 我们无法判断其是否位于畏兀儿与宋之间。

上述圆形地图中所标畏兀儿自然是指高昌回鹘。据该书 Uyyur “畏兀儿”条, 畏兀儿著名城市包括唆里迷、高昌、彰八里、别失八里、仰吉八里五城。^② 不过, 仰吉八里位于别失八里西, 地理位置与上述不知名二城不符。如是, 笔者视作上述不知名二城中西面的城市, 即位于高昌与彰八里之间的城市, 最大可能是在今乌鲁木齐附近。写于 925 年的于闐文钢和泰 (Staël-Holstein) 藏卷记录的西州回鹘地名中有乌鲁木齐之名。^③ 而东面的邻近可敦墓的不知名城市, 应为高昌东、今乌鲁木齐东偏南的哈密、纳职或蒲昌等。于闐文钢和泰藏卷同样记录有这些地名。另, 982 年佚名波斯文地理著作《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 记录的西州回鹘的 17 个地名中, 第 9 个为 Kh. mūd。^④ 虽然米氏对将其视作哈密存有顾虑, 但华涛教授肯定该地就是哈密。^⑤ 写作年代为 1019 年的德藏第 3 号回鹘文木柁文书是 Tängrikän (天汗) Körtlä 可敦夫

① 唆里迷即焉耆, 参见耿世民、张广达:《唆里迷考》,《历史研究》1980 年第 2 期, 收入张广达:《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 第 37—41 页。

② Maḥmūd al-Kāšyarī,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 1, pp. 139-140;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 1 卷, 第 120—122 页。

③ H. W. Bailey, “The Staël-Holstein Miscellany,” *Asia Major*, n. s., vol. 2, no. 1, 1951, p. 14;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の西遷について》,《東洋学報》第 59 卷第 1、2 号, 1977 年, 收入氏著:《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 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2015 年, 第 291—292 页。年代考订见 E. G. Pullyblank, “The Date of the Staël-Holstein Roll,” *Asia Major*, n. s., vol. 4, no. 1, 1954, p. 90.

④ V. Minorsky,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A Persian Geography*, London: Messrs, Luzac, 1937, p. 95; 佚名:《世界境域志》, 王治来译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 第 70 页。

⑤ 参见华涛:《西域历史研究 (八至十世纪)》第 3 章《高昌回鹘在东部天山地区的发展》,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第 134 页。

人一家捐资兴建寺院时的纪念文，其中记录的捐资者名单中，排在宰相之后的是 Qamīl Ögä “哈密立于越” İnal Bürt “亦难 Bürt”。^① 考虑到哈密不仅是高昌回鹘的重要城市之一，更是其通往东方的门户，位置险要，将圆形地图记录的高昌回鹘域内最东面的城市视作哈密，应最合理。

总之，Qatun Sini “可敦墓”之西不论是否为畏兀儿之地，抑或哈密、唐古特，该图反映的是：Qatun Sini “可敦墓”所在地区位于高昌回鹘之东，与可敦墓处于同一纬度的高昌回鹘城市是在哈密一带。就此而言，Qatun Sini “可敦墓”很难判定为与高昌回鹘之间间隔有西夏、且位置偏南的呼和浩特南郊的昭君墓。进言之，据 Qatun Sini “可敦墓”与哈密一带处于同一纬度而言，难以想象二者之间会有位置偏南的唐古特存在。与此相对，连接漠北与今新疆的通路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草原游牧政权如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的大军都是从漠北向西方的阿尔泰山、北庭、哈密立一带出征。特殊情况下，今新疆地区与中原政权间会通过漠北取得联系。当吐蕃侵占唐河西地区时，留守今北庭的唐朝驻军是先东行抵达漠北回鹘之地，即先利用“回鹘路”后再折向南。981年，出使高昌回鹘的宋使王延德，亦经由漠北的九姓达靺之地前往高昌回鹘。契丹与高昌回鹘的交往，也多经由漠北的可敦城之地。^② 如此，Qatun Sini “可敦墓”完全存在位于漠北的可能。

史载唐朝曾有和亲公主下嫁回鹘。其中的小宁国公主“历配英武、英义二可汗”，^③ 终于回鹘。王延德《使高昌记》介绍自己在经过漠北九姓达靺之地时云“次历拽利王子族。有合罗川，唐回鹘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④ 前田氏考证，上述拽利王子族居地内的“唐回鹘公主所居之地”，即是契丹为了加强对阻卜诸部的防御和统治，于统合二十二年（1004）设置的镇州建安军治所，即镇州可敦城。^⑤ 镇州可敦城遗址在今蒙古国布尔根省南部喀鲁河下游之南、哈达桑之东20公里的青托罗盖地方，^⑥ 位于杭爱山脉东端的鄂尔浑河以东、土拉河附近。小宁国公主或其他公主死后，被埋葬在其生前居住地即回鹘时期的可敦城附近，这是自然选择。契丹的镇州可敦城即是对包括上述唐和亲公主墓地在内的其生活过的城池进行整修后所建，契丹人称之为可敦城极其自然。当然，也有可能把比较拗口的“可敦墓城”简称为“可敦城”。而突厥语 Qatun Sini，无疑是忠实的译名。

- ① 国内外关于德藏回鹘文木柁文书的研究成果众多，兹不赘述。最新最翔实的研究，参见森安孝夫：《西ウイグル王国史の根本史料としての棒杭文書》，《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第678—730页。其中，年代考证见第683—689页，相关研究史归纳见第679—683页，哈密立于越见第697—698页。
- ② 《辽史》卷82《耶律隆运传》言其孙捺鲁重熙（1032—1054）年间任西北路招讨使，“后以私取回鹘使者獾毛裘，及私取阻卜贡物”云云（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424页）。当时的辽西北路招讨司位于阻卜地内的镇州可敦城，参见陈得芝：《辽代的西北路招讨司》，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组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2期，《南京大学学报》专辑，1978年，第7—15页，收入氏著：《蒙元史研究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38页。关于契丹通过漠北之地与西方间的贸易往来，主要参见長沢和俊：《遼の西北路経営について》，《史学雑誌》第66編第8号，1957年，第79—81页，收入氏著：《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東京：国書刊行会，1979年。另关于高昌回鹘与契丹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参见华涛：《高昌回鹘与契丹的交往》，《西域研究》2000年第1期。
- ③ 《旧唐书》卷195《回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10页；《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25页。
- ④ 《古行记四种校录》，《王国维遗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5页。
- ⑤ 前田直典：《十世紀時代の九族達靺——蒙古人の蒙古地方の成立——》，《元朝史の研究》，第237—239页。
- ⑥ 陈得芝：《辽代的西北路招讨司》，《蒙元史研究丛稿》，第32—33页；白石典之：《9世紀後半から12世紀のモンゴル高原》，《東洋学報》第82卷第4号，2001年，第592页。

综上,笔者得出的结论是:将 Qatun Sini “可敦墓”视为漠北的可敦城,即契丹的镇州可敦城,自无问题;唯镇州可敦城地理方位,与位于“西夏与契丹”之间——即喀什噶里所言 Qatun Sini 的位置略有出入,笔者将在文末给出意见。

二、《突厥语大词典》圆形地图所见 Ötükän “于都斤”

关于漠北的 Ötükän “于都斤”,喀什噶里言是邻近回鹘之地的达靺草原中的一个地名。^①而圆形地图标注的该地大致处在八刺沙衮东北 45° 的方位上,与可敦墓地望相差极大。是故,钟焯以为此差异“足证喀什噶里根本就不认为郁督军山以北地区和可敦墓之地是在同一地理单元内。故在漠北腹地去寻觅可敦墓的位置无异于缘木求鱼”。^②笔者不敢苟同。

圆形地图标注的 Ötükän “于都斤”,西南紧靠额尔齐斯河源头,隔河与 Yemäk “咽蔑”漠野相望,与通常所知的于都斤——漠北达靺地内的杭爱山脉明显不符。而记录喀喇汗朝与额尔齐斯河流域等地的异教徒之间战斗的诗歌反映,^③喀什噶里对这一地区比较熟悉,但他在相关章节中并未对 Ötükän “于都斤”作任何介绍。而达靺漠野则被标在了额尔齐斯河以西的伊犁河源头之西,这与为人所知的漠北达靺之地截然不同。是什么原因导致喀什噶里关于 Ötükän “于都斤”和达靺之地的看法,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偏差呢?

波斯学者葛尔迪吉 (Gardizi) 1050 年前后所著《记述的装饰》(Zainu’I-Axbār) 一书中,记录了基马克 (Kimek) 部落出自 Tatar “达靺”的传说。其中说到达靺人的首领死后,其二子不和,次子设带着情人逃到了额尔齐斯河流域。之后,七个出自达靺的仆人——Īmī、咽蔑 (Īmāk)、塔塔尔 (Tatār)、Bayāndur (或 Bilāndir)、钦察 (Qifčaq)、Lāniqāz、Ajlād 投奔设。后来,在达靺本部遭到敌人攻击后,其他部落也投向他们,进而按上述七人分成七个部落居住在额尔齐斯河地方。^④无疑,达靺部落移居至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年代,定早于喀什噶里所处的年代。

《世界境域志》还记录钦察是从基马克分出来的一个氏族,但其国王是由基马克任命。^⑤据高登 (P. B. Golden) 介绍,关于俄罗斯编年史记录的 12 世纪钦察联盟中的 Toqsoba / Toysoba 部族,14 世纪后半叶至 15 世纪初的伊斯兰学者伊本·赫勒敦 (Ibn Khaldūn) 指出:“玉里伯里 Ölberli 构成 (钦察东部集团) 之一部,同样构成钦察东部集团之一部族的 Toqsoba,即露西 (俄罗斯) 史料所谓的 Polovci Dikii 也源自达靺。”^⑥虽然我们还无法确定 Toqsoba / Toysoba 的

① Maḥmūd al-Kašy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1, p. 159.

② 钟焯:《辽代东西交通路线的走向——以可敦墓地望研究为中心》,《历史研究》2014 年第 4 期,第 39 页。

③ 相关诗文的归纳与分析,详见 R. Dankoff, “Three Turkic Verse Cycles Relating to Inner Asian Warfare,” pp. 154-157, 160-161.

④ A. P. Martinez, “Gardizi’s Two Chapters on the Turks,”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vol. 2,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2, pp. 120-121; 瓦·弗·巴托尔德:《加尔迪齐著〈记述的装饰〉摘要》,王小甫译,《西北史地》1983 年第 4 期,第 107—108 页;刘迎胜:《九—十二世纪民族迁移浪潮中的一些突厥、达旦部落》,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 12、13 合期,《南京大学学报》专辑,1990 年,第 80—106 页,收入《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新疆历史研究论文选编 (辽宋金卷)》,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11—13 页。

⑤ V. Minorsky,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A Persian Geography*, p. 101, § 21.

⑥ P. B. Golden, “Cumanica II: The Ölberli (Ölperli): The Fortunes and Misfortunes of an Inner Asian Nomadic Clan,” in *Nomads and Their Neighbours in the Russian Steppe: Turks, Khazars and Qipchaqs*, Aldershot, U. K.: Ashgate Publishing, 2003, p. 22; P. B. Golden, “Cumanica IV: The Tribes of the Cuman-Qipchaqs,”

真正含义，但重要的是这个氏族出自达靺。

据以上介绍，可知在基马克部落的发展过程中，原属其最初七部族之一的钦察获得了壮大，其中包含出自达靺的部族。高登虽然对库蛮（Cuman，钦察联盟中靠近西部的部分）中的东方要素玉里伯里 Ölberli 进行了系统分析，但对葛尔迪吉关于基马克起源的传说，并未给予足够重视。虽难以一一考证，刘迎胜教授通过对欧亚草原东西方之间民族移动事例之分析，指出葛尔迪吉关于基马克起源传说的背后应该有真实的历史基础，此说不误。同时，他推定上述达靺人的移居约发生在回鹘西迁之前或之后，足备一说。^①

在喀什噶里的圆形地图上，钦察之地位于怛逻斯北偏东，与达靺漠野所在地——伊犁河源头以西之间，虽有一不明地理名称，但相距并不遥远。考虑到喀什噶里对中亚地区进行过实地调查，他把达靺漠野标记在伊犁河源头之西，想必不会是空穴来风。这可与前面介绍的基马克源自达靺、钦察部族中包括出自达靺的部落等信息互补。按此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喀什噶里把 Ötükän “于都斤” 标在西南紧靠额尔齐斯河源头之地的缘由。即，他虽然与葛尔迪吉都知道基马克部落源自达靺这一传说的存在，但关于 Ötükän “于都斤”，他仅了解到是邻近回鹘（即高昌回鹘）之地的达靺沙漠中的地名。是故，他才把于都斤之地标在与其认为的达靺漠野并不遥远、且与基马克部落的产生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额尔齐斯河流域。

综上，以圆形地图给出的于都斤的地理方位为参照物，借以探讨包括 Qatun Sini “可敦墓” 在内的其他相关地理名称的位置，这一做法的前提偏离了正常的研究轨迹，其结论难言公允。

三、可敦墓即青冢说之质疑

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sin “身长” 词目中介绍，墓穴被称为 sin，是因为其根据人的身长而制作。之后，作为 sin “墓穴” 的用例，引用了 Qatun Sini “可敦墓”，并言 Qatun Sini 是位于党项与 Sin “秦（中国）” 之间的一座城市。^② 而 Sin 在 Tawyač “桃花石（中国）” 词目下作如下介绍：现在 Tawyač 指的是 Māsin “马秦（宋）”，而契丹指的是 Sin “秦”。^③ 看来，位于党项与 Sin “秦” 之间的 Qatun Sini 城，实际上位于“西夏与契丹”之间。

米氏与张广达教授视 Qatun Sini “可敦墓” 为可敦城，或源自把 sin 视作汉语的“城”。笔者曾就此讨教阿拉伯语专家，得到的反馈是存在这一可能。钟焯认为，视 sin 为汉语“城”的借词的观点，就韵尾-n 与-ng (-ŋ) 而言，远不能视作可以接受的定论。^④ 笔者此处无意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讨论；唯想补充的是，在讨论汉语“城”与突厥语中的汉语借词之对音关系时，钟焯未考虑到中古汉语的西北方音。若从西北方音着手进行论证，恐怕更具说服力。^⑤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Wiesbaden: Harrasowitz Verlag, vol. 9, 1997, pp.119-120.

- ① 刘迎胜：《九—十二世纪民族迁移浪潮中的一些突厥、达旦部落》，《新疆通史》编撰委员会编：《新疆历史研究论文选编（辽宋金卷）》，第11—13页。
- ② Maḥmūd al-Kāšyārī,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 2, p. 218; 另见第315页所引关于唐古特与 Qatun Sini 间战斗的诗文。
- ③ Maḥmūd al-Kāšyārī,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 1, p. 341.
- ④ 钟焯：《辽代东西交通路线的走向——以可敦墓地望研究为中心》，《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第36—37页。
- ⑤ 据语言学领域的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中，鼻收声韵尾-ŋ 已经出现脱落或鼻化成-m 的现象，参见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年，第38—42、145—146页；高田時雄：《コータン文書中の漢語語彙》，尾崎雄二郎、平田昌司編：《漢語史の諸問題》，京都：京都大

巴托尔德 (W. Barthold) 早已介绍, 在比鲁尼著《麻苏迪宝典》中可见与 Qatun Sini “可敦墓”相同的地名。^① 据米氏转引, 比鲁尼书中确有地名 Khātūn-sin “贵妇人墓”。^② 鉴于此点, 喀什噶里把 Qatun Sini 解释做“可敦墓”是有其依据的。

古今中外, 名胜古迹成为其所在地的代名词 (地理名称) 之例并不少见。Qatun Sini “可敦墓”之得名应属此例。大概在喀什噶里生活的年代, 东方某地存在一个贵妇人 (可敦) 之墓。在突厥语和阿拉伯语文献中, 该墓成为其所在地的地理名称。就“西夏与契丹之间”这一地理位置而言, 钟焯提出的昭君墓 (青冢) 固然可备一说, 但仍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

首先, 存在名称上的龃龉。检《辽史》, “青冢”之名共出现七次。其中《地理志五》“西京道·丰州”条云“丰州, 天德军, 节度使。……有大盐砾、九十九泉、没越砾、古磧口、青冢——即王昭君墓。兵事属西南面招讨司”。^③ 而昭君墓之名仅在此处出现过一次。与喀什噶里所处时代最为接近的《辽史》之记载反映, 当时的人更多是以青冢来称呼昭君墓。而且, 诚如钟焯所言, 诗文中经常可见青冢之名。假定昭君墓为远在中亚的喀什噶里所知, 那在突厥语中相应的以青冢的音译或直译出现的概率无疑会更高。更何况, 王昭君仅是匈奴单于阏氏 (yančī, 妻子之意) 之一, 非正室,^④ 青冢从未被称为皇后墓或可敦墓。窃以为昭君墓果真出现于突厥语中, 那以 yančī sini 出现的几率无疑要高于 qatun sini。因为, yančī “妻子”一词在 10 世纪的突厥语族黠戛斯人中仍然得以使用。^⑤

其次, 逻辑思维上的本末倒置。昭君墓位于今呼和浩特南郊, 地属辽西京道丰州天德军。辽丰州天德军治所位于今呼和浩特东郊, 地理位置上虽与唐五代天德军治所不同, 但名称无疑袭自唐代。^⑥ 至 13 世纪后半叶, 经由西亚中亚来华的马可·波罗 (Marco Polo), 仍然把包括今呼和浩特在内的汪古部辖地称为天德 (Tenduc) 州, 介绍其主城名曰天德 (当时已改称丰州)。^⑦

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988 年, 第 126 页; 高田时雄: 《ウイグル字音史大概》, 《东方学报》(京都) 第 62 卷, 1990 年, 第 336—337 页。而且, 鼻收声韵尾的消失可能从五代起就扩展到了 -n 与 -m 中, 参见罗常培同书第 146 页。高田时雄则认为西北方言的主要语音特点中包括鼻韵尾 -ŋ、-m、-n 的弱化或消失, 参见 T. Takata, “Phonological Variation among Ancient North-Western Dialects in Chinese,” in I. Popova and Y. Liu, eds., *Dunhuang Studies: Prospects and Problems for the Coming Second Century of Research*, St. Petersburg: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2012, pp. 244-245.

① 巴托尔德: 《中亚突厥史十二讲》, 罗致平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 第 102 页。

② V. Minorsky, *Sharaf al-Zamān Ṭāhir Marvazī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pp. 68-69.

③ 《辽史》卷 41 《地理志五》, 第 580 页。相关考证见李逸友: 《〈辽史〉丰州天德军条证误》, 《内蒙古文物考古》1995 年 Z1 期。

④ 阏氏并非指皇后, 可参见兰殿君: 《“阏氏”并非匈奴皇后的专称》, 《文史杂志》1989 年第 2 期, 第 36 页。

⑤ 阏氏无疑与叶尼塞碑铭中的 yančī “妻子”有着密切联系, 如笔者介绍过的哈尔毕斯·巴里碑铭即出现此词。参见白玉冬: 《十至十一世纪漠北游牧政权的出现——叶尼塞碑铭记录的九姓达勒王国》, 《民族研究》2013 年第 1 期, 第 76 页碑铭南 1 行。

⑥ 关于辽天德军治所, 可参见李逸友: 《〈辽史〉丰州天德军条证误》, 《内蒙古文物考古》1995 年 Z1 期; 何天明: 《辽代西南面招讨司探讨》, 《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 年第 6 期。唐天德军治所参见张郁: 《唐王逆修墓发掘纪要》, 《内蒙古文物考古》1982 年第 1 期, 收入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魏坚主编: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 2 辑,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年, 第 514—515 页。

⑦ 主要参见 H. Yule,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 vol. 1, London: John Murray, 1903, pp. 284-285; P.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vol. 2,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59-1963, pp. 849-851; 《马可波罗行纪》, 沙海昂注, 冯承钧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年, 第 150—151 页。

若马可·波罗来华之际北方汉语入声韵尾已经彻底消失，则马可·波罗所记 Tenduc 来自汪古人说的突厥语的可能性更大。总之，这些均表明，无论是从战略地位还是从历史渊源而言，历史上天德军之名都远超青冢。尤其是，写作年代约在大中五年（851）的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出土文书《驿程记》记录了由西受降城经天德军、中受降城（位于今包头市南郊）、振武（位于今呼和浩特南土城子古城）等前往雁门关的行程。其中，自中受降城至振武的驿站分别是神山关、云迦关、长平驿、宁人驿、子河驿，但并未出现青冢或昭君墓之类的驿站名称。^① 这从侧面反映，历史上的青冢虽然多次出现于诗文之中，但它仅仅是一个文人墨客抒发情怀的风景雅致之地，在晚唐时期的重要性远比不上天德军，甚至还达不到边陲驿站的重要性。换言之，辽代的青冢，根本无法替代天德军成为今呼和浩特一带的代名词。Qatun Sini 之所以以可敦墓之名而为人所知，应该是在其周边并无其他知名城镇。

综上，若我们仅把目光聚焦到 sin “墓”而忽略对 Qatun Sini 内涵的分析，并试图探寻出一个与墓相关的地名来解决这一问题——此类研究固然有规有矩，但无异于刻舟求剑。

四、唐古特与 Qatun Sini “可敦墓”间战事的背景

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čoyila- “（水）汨汨流”词目明确记录 Qatun Sini “可敦墓”的人们与唐古特族间发生战斗：

1 行 qatun sini čoyiladi 2 行 tangut bağin yayiladi
3 行 qanı aqıp žayiladi 4 行 boyın suvın qizil saydı

Qatun Sini 沸腾了。他们（即 Qatun Sini 的人们）与唐古特族（即党项族）的伯克（即酋，氏族或部族首领）成为了敌人。他们（即 Qatun Sini 的人们）的鲜血汨汨流淌。他们（即 Qatun Sini 的人们）从颈部流了血水。^②

上文所见 Qatun Sini 中，末尾的-i 是表示第三人称所有的附加词缀。Qatun Sini 为 Qatun 之那 Sin 之意，与 Qatun Sin 意思相同。以诗文形式流传于突厥语族民族之间的上述战斗，无疑要早于《突厥语大词典》的成书时间。

记录同时期西夏历史的《宋史·夏国传》载有李元昊占据河西地区后呈给宋廷的奏文，其中提到“吐蕃、张掖、交河、塔塔（即达鞑），莫不从服”。^③ 同时，作为反映同时期西夏与达鞑关系的辽朝方面史料，《辽史·兴宗纪二》载重熙十三年（1044）“六月甲午，阻卜酋长乌八遣其子执元昊所遣求援使窟邑改来，乞以兵助战，从之”；《兵卫志下》云“元昊、谅祚智勇过人，能使党项、阻卜掣肘大国”。^④ 而《宋会要辑稿》则载“至道二年十月，甘州可汗附达怛国贡方物，

① 高田時雄：《李盛鐸舊藏寫本〈驛程記〉初探》，《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5号，2011年，第2—3頁；陈国灿：《读〈杏雨书屋藏敦煌秘笈〉札记》，《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1期，第118—120頁；齊藤茂雄：《唐後半期における陰山と天德軍——敦煌発現〈驛程記断簡〉（羽〇三二）文書の検討を通じて——》，《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第47輯，2014年，第79—82頁；白玉冬：《沙州归义军政权大中五年入朝路再释》，《内蒙古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第85—86頁。

② Maḥmūd al-Kāšyari,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vol. 2, pp. 314-315;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3卷，第313—315頁 čoyiladi（原文误作 čayiladi）。另，中英文译注者在词目 yopila- “欺骗”之下，补注唐古特人的可汗曾欺骗 Qatun Sini 之王并以死攻击。分别见上引两书第163頁与第316—317頁。

③ 《宋史》卷485《夏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5頁。

④ 《辽史》卷19《兴宗纪二》、卷36《兵卫志下》，第263、489頁。

因上言愿与达靺同率兵助讨李继迁，优诏答之”。^① 孙修身指出，这是由于党项的隔断，甘州回鹘才北同达靺（即漠北的九姓达靺，亦即阻卜）联手，附之而走草原路朝贡于宋。^② 按此而言，似乎漠北的阻卜—达靺部落最初曾对抗党项，但后来有一部分达靺人受控于西夏。

关于漠北的达靺部落在 10 世纪初期即已深入河西地区，笔者曾专作考释。^③ 而且，上引拙文《十世纪时期的九姓达靺与丝路贸易》正是论证敦煌文书记录的 10 世纪与沙州归义军政权间有过使节往来或冲突关系的达靺是出自漠北，11 世纪初期契丹与沙州之间的密切往来应视作此前的沙州与九姓达靺间使者往来之延续。钟焯只关注到 Qatun Sini “可敦墓”，以及辽夏之间达成和解的 11 世纪后期的情况，而忽略了上述拙文重点讨论的 10 世纪末至 11 世纪初期的情况，是顾此失彼。尤其是，虽然史料明确记载重熙十八年冬十月附属于辽朝西北路招讨司的阻卜（达靺）诸军参加了辽兴宗亲征西夏之役，^④ 但他仍然认为这些达靺部落是活动在西夏近边地带，^⑤ 有失公允。其作为证据引用的西夏王陵汉字残碑记录的“北塞鞑靺”、“变俗用夏”、“贺兰马蹄峰”等内容，恰恰说明西夏曾征服过部分漠北的达靺部落。因为这些残碑属于西夏仁宗时期墓碑文，所记当为 12 世纪中后期之事，^⑥ 而且，上述残碑文字更让人联想到漠北克烈部中王汗弟札阿柑孛等曾被西夏俘获过的人物。^⑦ 是故，笔者以为，将上述与唐古特族发生过战斗的 Qatun Sini “可敦墓”视作漠北达靺地内的镇州可敦城，最具说服力。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虽主张 10 世纪漠北的达靺部落与河西走廊不同政治体间发生联系，但并非断然否定当时的河西地区不存在达靺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达靺人或因冲突、或因贸易等，部分进入到河西地区实属情理之中。如敦煌文书 P. 3579《宋雍熙五年（988）十一月神沙乡百姓吴保住牒》谈到吴保住被贼人打劫到伊州，后被沙州使安都知般次押衙曹闰成从“柔远家”处赎买，二人返回沙州途中“左（佐）于达怛边，卖老牛一头，破与作粮”。^⑧ 上文“达怛”即达靺人，应在柔远至沙州之间。另据敦煌出土于阕文文书记录，10 世纪在于阕和沙州之间确有达靺人在活动。^⑨ 笔

- ①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北京：中华书局，1957 年，第 7714 页。年代据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47《四裔二四·回纥》，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第 2721 页。
- ② 孙修身：《试论甘州回鹘和北宋王朝的交通》，《敦煌研究》1994 年第 4 期，第 47 页。
- ③ 白玉冬：《于阕文 P. 2741 文书所见鞑靺驻地 Buhāthum 考》，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 2 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年，第 231—243 页。
- ④ 《辽史》卷 20《兴宗纪三》，第 275 页。
- ⑤ 钟焯：《辽代东西交通路线的走向——以可敦墓地望研究为中心》，《历史研究》2014 年第 4 期，第 39 页。
- ⑥ 宁夏博物馆发掘整理，李范文编释：《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年，第 23—24 页，图版 38、48、53；张久和：《原蒙古人的历史：室韦—达怛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188 页。张氏认为该达靺是阴山达靺，笔者难以苟同。
- ⑦ 李范文：《西夏陵墓出土残碑考释》，《西夏研究论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117—118 页；孟楠：《论克烈人与西夏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 年第 3 期，第 38—39 页。
- ⑧ 录文主要参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2 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 年，第 308 页；陆庆夫：《河西达怛考述》，郑炳林主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559 页。“柔远家”应指伊州柔远县当地部族。相关介绍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32 页。
- ⑨ H. W. Bailey, “Tattara,” in *Indo-Scythian Studies Being Khotanese Texts Volume V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92-94. 介绍其刊布的《塞语文献文书卷 (Saka Documents Text Volume)》第 2 卷第 77 页提到于阕使者曾与 Kūysa 地方的达靺人首领进行物物交换。笔者查阅施杰我关于 Khot missing frags. 2 的最新研究 (P. O. Skjærvø, *Khotanese Manuscrip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in the British Library*,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2002, p. 577), 惜未能发现相关叙述。或许贝利所言文书编号出现了偏差。

者想要强调的是，这些达斡人或是随回鹘移居的随波逐流者，或是游牧集团的前哨末端，不可能替代达斡本部而成为历史主角。

五、11世纪初期契丹与中亚之交通

马卫集《动物的自然属性》记录有通往东方之旅程。该书第19节中介绍有从喀喇汗朝首都喀什噶尔经由于阆到达沙州后，通往Sin（秦，即中国）、契丹和回鹘（西州回鹘）的三条路线。其中，契丹的路线为“从沙州往东约二个月到达Khātūn-san，然后一个月到达Ütkin，再需要一个月到达契丹首都Üjam”。^①米氏认为，上述有关从沙州到达契丹首都之路程的原始情报，当来自马卫集书中第22节所介绍的、于牛年（1027）同西州回鹘使者一同访问哥疾宁朝，并递交国书（以回鹘文写成）的契丹使者。

据巴托尔德介绍，葛尔迪吉书中记录两位非穆斯林的突厥汗在1026年遣使访问哥疾宁朝，但因文本问题，突厥汗的称号并不能确定。^②米氏在《动物的自然属性》译注中指出，葛尔迪吉与马卫集记录的为同一事件，派遣使者的突厥汗是契丹可汗与西州回鹘可汗。^③另，据马卫集提供的契丹国书内容，可知当时的契丹希望与哥疾宁朝结成友好关系，而且辽圣宗太平元年（1021）契丹可老公主下嫁的大食太子册割即为喀喇汗朝卡迪尔汗（Qadir Khān）之子Chaghri Tegin。^④此处，笔者关注的是契丹使者是与西州回鹘使者一同出使哥疾宁朝的。

统合二十二年，在可敦城设置镇州建安军之后，契丹无疑加强了对漠北达斡一阻卜诸部的控制，其对蒙古高原的统治优势得到了极大保证。此后，契丹以镇州可敦城为据点，依托镇州建安军的军事威慑力，增强了对沙州归义军政权之影响。其直接结果是1006—1020年间沙州与契丹间的六次使者往来。^⑤而出使哥疾宁朝的契丹使者，显然是经由漠北可敦城之地后与西州回鹘使者会合。考虑到当时喀喇汗朝的势力扩张，以及喀喇汗朝与高昌回鹘、哥疾宁朝间的紧张关系，^⑥上述使者虽然有可能抵达沙州与西州，但能否经由喀喇汗朝之地前往哥疾宁朝，在马卫集书获得刊布之前确实是个未知数。幸运的是，马卫集记录的契丹使者带给哥疾宁朝统治者的国书中明言“今有贵主下嫁于卡迪尔汗之子察格里特勤，结成盟好，故命卡迪尔汗开道路，庶几此后聘使往还无碍”。^⑦看来，1021年契丹可老公主下嫁喀喇汗朝册割太子后，契丹与喀喇

① V. Minorsky, *Sharaf al-Zamān Ṭāhir Marvazī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pp. 18-19. 关于Khātūn-san与Khātūn-sinī之讨论，见第74页。

② 相关介绍见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上）》，张锡彤、张广达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29页及其注3；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第91页。

③ V. Minorsky, *Sharaf al-Zamān Ṭāhir Marvazī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pp. 76-77.

④ 代田貴文：《カラハン朝の東方発展》，《中央大学大学院研究年報》第5輯，1976年，第261—263頁；黄时鉴：《辽与“大食”》，《新史学》（台北）第3卷第1期，1992年，收入《黄时鉴文集》第2册，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23—26页；胡小鹏：《辽可老公主出嫁“大食”史实考辨》，《西北师大学报》1995年第6期，后收入《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7—82页。

⑤ 白玉冬：《十世紀における九姓タタルとシルクロード貿易》，《史学雑誌》第120編第10号，第20—21頁。

⑥ 代田貴文：《カラハン朝の東方発展》，《中央大学大学院研究年報》第5輯，第255—264頁。

⑦ V. Minorsky, *Sharaf al-Zamān Ṭāhir Marvazī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pp. 19-21. 中译文主要参见周一良：《新发现十二世纪初阿拉伯人关于中国之记载》，《思想与时代》第41期，1947年，收入

汗朝得以保持友好关系，才使得契丹与回鹘使者经由喀喇汗朝前往哥疾宁朝成为了可能。

关于上述沙州至中国、契丹的路程，米氏进行了详细分析。他介绍了比鲁尼《麻苏迪宝典》的相关记录，并进行了对比。据其介绍，比鲁尼当时正奉职于哥疾宁朝宫廷，且直接接触过契丹使者。米氏指出，比鲁尼书中相关地名之说明，与马卫集书中所言一致。他进而认为，马卫集笔下的地名 *Khātūn-san* 与比鲁尼记录的 *Khātūn-sin* “可敦墓”实为同地。^① 考虑到比鲁尼曾直接与契丹使者见面，而马卫集很可能利用了哥疾宁朝的官方记录，而且，就相关派遣使者之事还为 1050 年成书的葛尔迪吉书所记录而言，上述有关从沙州前往契丹首都之路程的情报，诚如米氏所言，无疑来自 1027 年与西州回鹘使者一同访问哥疾宁朝的契丹使者。米氏虽认为马卫集记录的 *Ūtkin* 的音值与漠北的 *Ötükān* “于都斤”相近，但因于都斤之地距契丹使者的出使路途过于遥远，故主张 *Ūtkin* 应为《辽史》记录的南京（今北京市）西北的武定军。^② 米氏按武定军的现代音 *Wu-ting-kiun* 与 *Ūtkin* 进行比定，凸显其意见的勉强之处。相反，笔者以为，马卫集记录的 *Ūtkin* 应即 *Ötükān* “于都斤”。^③ 钟焯亦与笔者持相同意见。^④

不过，钟焯以为马卫集书中虽然保留了更早时候辽朝致中亚国家的国书，但上述喀喇汗朝前往契丹的路程不应是反映一个多世纪前相对滞后的信息，并论证连接着漠北草原的丰州在辽金元时期的丝路贸易上发挥着东西南北间交通枢纽作用。需要补充的是，笔者虽然主张上述喀喇汗朝至契丹的路程记录的是 11 世纪初期的情况，且经由漠北之地，但笔者并未否定当时漠南地区亦存在沟通东西方的通道。而且，辽夏关系趋于友好的 11 世纪下半叶以降，辽朝与西夏自然可以经由今河套一带进行交流。故笔者对钟焯上述有关东西方间交流之考证大体赞同，唯以为其有关路程年代之考释难以服众。何况，马卫集书中关于一个多世纪以前，甚至更为陈旧的内容比比皆是。

关于上述喀喇汗朝至契丹路程的走向，钟焯基于 *Qatun Sini* “可敦墓”为昭君墓，主张“符合实际的情形应当是从可敦墓（即其主张的昭君墓）向北经行月余可达漠北都督军（即 *Ötükān* “于都斤”）之地，同时从可敦墓向东行进在一月内即可到达 *Ūjam*”，并认为这是由于缺乏实际旅行经历的作者所发生的地点方位间的舛乱，“以致将丰州、都督军之地、*Ūjam* 误解为一条全长两月行程的东西要道上三个里程碑似的节点。”鉴于钟焯并未对 *Ūtkin*、*Qatun Sini* “可敦墓”与 *Ūjam* 三地间相互位置关系给予关注，此处略加讨论。

据米氏介绍，比鲁尼书中，契丹、*Qatun Sin*、*Ūtkin* 三地地理坐标如下：契丹：经度为 $158^{\circ}40'$ ，纬度为 $21^{\circ}40'$ ；*Qatun Sin*：经度为 $129^{\circ}40'$ ，纬度为 $31^{\circ}50'$ ；*Ūtkin*：经度为 $136^{\circ}30'$ ，纬度为 $26^{\circ}0'$ 。据此可知，*Qatun Sin*、*Ūtkin* 均位于契丹西北。就上述 *Ūtkin* 与契丹间的位置关系而言，*Ūtkin* 无疑应为漠北的 *Ötükān* “于都斤”。不过，上述三地地理坐标同时反映，*Qatun Sin* 又位于 *Ūtkin* “于都斤”之西北。显然，这一地理分布与镇州可敦城位于于都斤山之东这一实际位置相矛盾。米氏根据比鲁尼记录的一系列地理坐标，推定沙州与 *Qatun Sin* 之间的距离为

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 年，第 410—411 页；陈述辑校：《全辽文》，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 15—16 页。

- ① V. Minorsky, *Sharaf al-Zamān Tāhir Marvazī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pp. 68-70.
- ② 武定军见《辽史》卷 41《地理志五》“西京道·奉圣州”条，第 582 页。另米氏相关考证见 V. Minorsky, *Sharaf al-Zamān Tāhir Marvazī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pp. 73-74.
- ③ 白玉冬：《十世紀における九姓タタルとシルクロード貿易》，《史学雑誌》第 120 編第 10 号，第 9、16 页。
- ④ 钟焯：《辽代东西交通路线的走向——以可敦墓地望研究为中心》，《历史研究》2014 年第 4 期，第 43—44 页。

1610公里，Qatun Sin与Ütkin间距离为925公里，Ütkin与契丹间距离为2253公里。^①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得知，沙州与杭爱山脉即与Ütkin“于都斤”间直线距离约800—900公里，杭爱山脉与Qatun Sin即与镇州可敦城间约300—400公里，镇州可敦城与契丹上京间约1200公里。^②显而易见，米氏根据比鲁尼的坐标计算出来的四地间的相互距离，与现代地图所反映的实际距离不符。但若将比鲁尼记录的Qatun Sin与Ütkin位置互换，则可以发现沙州、Ütkin、Qatun Sin、契丹四者位置与现在的实际地理位置基本一致。看来，比鲁尼混淆了Qatun Sin与Ütkin的经度，而马卫集记录的从沙州先到达Khātūn-san再到达Ütkin这一路程，则是沿袭了比鲁尼的错误。

综上，关于马卫集记录的由喀喇汗朝前往契丹的交通线，笔者以为是从沙州经由漠北的于都斤与镇州可敦城之地后抵达契丹。不过，这反映的应该是11世纪初期的情况。同时，笔者并不否认当时在漠南地区存在连接契丹与西夏、喀喇汗朝的通路。喀什噶里言Qatun Sini“可敦墓”是位于党项与Sin“秦（中国，此处指契丹）”之间的一座城市，是因为其依据的相关材料里包括西夏占领沙州之后的内容，且当时的喀喇汗朝经由西夏入贡契丹，致使其作出上述推断。

拙文最终结论是：《突厥语大词典》圆形地图所见Qatun Sini“可敦墓”代指漠北的镇州可敦城，马卫集记录的由喀喇汗朝前往契丹的路程经由漠北于都斤地区和镇州可敦城。

不可否认的是，喀喇汗朝的优素甫·哈斯·哈吉甫（Yūsuf Khāṣṣ Hājib）于1070年所作的《福乐智慧》中有“契丹的商队带来了桃花石的商品”。^③按前文介绍的《突厥语大词典》Tawyaç桃花石（中国）而言，此处的“桃花石”代指宋朝，因此可以认为，有辽一代，漠南地区应当存在连接喀喇汗朝与契丹、宋之间的贸易通道。而上面介绍的途径漠北的情况，当属于11世纪初期情况。

〔作者白玉冬，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大连 116029〕

（责任编辑：路育松）

① V. Minorsky, *Sharaf al-Zamān Tāhir Marvāzī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 pp. 69-70.

②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5册，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91—1992年，第3—4页。

③ Yūsuf Khāṣṣ Hājib, *Wisdom of Royal Glory (Kutadgu Bilig) : A Turko-Islamic Mirror for Princes*, R. Dankoff t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 41.